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策划

清华社会学讲义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第二版)

赵鼎新◎著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Second Edition)

- 导论：社会运动与革命的界定及社会学研究方法
- 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
- 集体行为理论及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
- 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
- 社会结构与社会运动
- 国家与社会运动（上）
- 国家与社会运动（下）
- 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
- 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兴起
- 社会运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方式
- 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
- 新闻、大众舆论和社会运动
- 展望和总结



社 / 会 / 科 / 学 / 文 / 献 / 出 / 版 / 社





中国政法大学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第二版）

张宝成 著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Lectures



中国政法大学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政法楼
北京市海淀区
100088
010-59192222
www.cupl.edu.cn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策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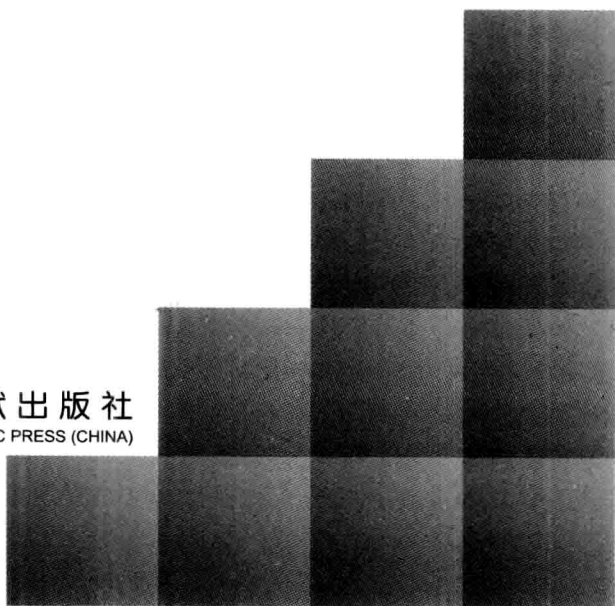
 清华社会学讲义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第二版)

赵鼎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赵鼎新著. —2版.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

(清华社会学讲义)

ISBN 978 - 7 - 5097 - 3030 - 0

I. ①社… II. ①赵… III. ①社会运动 - 研究 ②政治运动 - 研究 IV. ①C916 ②D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1510 号

· 清华社会学讲义 ·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第二版)


策 划 /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著 者 / 赵鼎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童根兴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李海云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1
版 次 / 2012 年 1 月第 2 版 字 数 / 363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030 - 0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清华社会学讲义》历经两年筹备，首批终于面世了。在我国社会科学恢复、重建已二十余年，似乎臻至成熟，各种各样的社会学教材可谓品类繁多、汗牛充栋的今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为什么还要组织这样一套讲义并付诸出版，理应在这里先行交代一番。

大体上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同仁筹办这套讲义，基于三点考虑。

第一，社会学必须有能力面对各种新的经济、组织、政治和文化现象。自 20 世纪末期以降，高新科技的发展、经济结构的演变、社会 - 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引发的巨大、深刻的变迁，使整个人类社会面对着一系列前所未闻的新问题。本系同仁认为：社会学这门学科，如果要在 21 世纪中生存下去，就必须有能力面对和处理这些新的问题，而要培育此种能力，就必须努力发展新的知识系统。本套讲义就是创新社会学知识系统的一个尝试。从列举的篇目中就可以看到：本套讲义的重点，是力求选取那些对研究新问题至为关切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加以介绍，而不复拘泥于传统的知识体系和结构。

第二，社会学应当对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的知识加以融会贯通，努力实现跨学科知识交流与创新，或者说，努力变成“新社会学”。这里所谓“新社会学”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社会学本身的知识内容，必得吸取人文社会科学诸相关领域的知识，才能实现发展和创新；另一层意思是说：社会学这门学科，亦有能力跨入人文社会科学诸相关领域，成为其他学科基本建设的一个环节。例如，组织行为研究就是商学院的一门基础课程，而社会研究方法则是当代各门社会科学学科所普遍使用的调查研究方法之一。所以本套教材的又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个方面用

力，力求展示出社会学知识与相关学科知识的交流与融合，力求变成“新社会学”。这也是当代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国际性的潮流。

第三，社会学的教科书在学术上应当有一个高起点。在社会学的各类著作中，教科书承担着导引和教育下一代学科从业人员的任务，其质量的高低、选材的优劣，直接模塑下一代学人，因而关系到社会学学科的未来。就此意义而言，教科书对于学科和学术建设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撰写教科书必须慎之又慎，将就不得。基于此种考虑，本套教材主要邀请那些在海内外学有所成，常年从事教学工作，而对中国国情又不陌生的中国学者撰写。在内容上，尝试将社会学的前沿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勾连起来，在两者之间架设一座桥梁；在形式上，则采取“讲义”形式，基本保留口语化特点，学理纵然艰深，但力求做到通俗易懂。

为确保出版质量，本套讲义选择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众所周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近年来在出版、刊行社会学著作方面用力最多的一家出版社，本套讲义凭借此家出版社之力，无疑是获得成功的一大保障。

自2000年正式建系伊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同仁即明确提出了本系学科和学术建设的宗旨：“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与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这两句话是本系同仁总结了国内社会学界的发展状况才提出来的。所谓“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是说社会学的研究问题，不应来自依据经典大师的语录而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剪裁，也不应来自权力机构的“长官意志”的提示，而应来自社会学者作为一个掌握了社会学知识的社会行动者，在这个社会里经由积年累月地探索和体验而提出的那些问题，那些问题必定是靠近这个社会的实际逻辑的；所谓“与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是说社会学对于这些本土问题的研究，其所形成的概念和理念，又不应该仅仅囿于本土范围，而必须超越本土，尝试着与西方社会学的前沿理论对话，以期丰富甚至推动整个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由此可见，这个宗旨提出的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任务。单独实践一面已很困难，要同时做到两面则可谓难上加难。本系同仁深知实践这一宗旨殊属不易，而将之作为长远的努力方向。希望本套教材的出版，向着达致此一目标前进了一步，哪怕只是一小步。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诸同仁

二〇〇三年十月

第二版序

本书是一本专门介绍社会运动研究的理论与社会学分析方法的著作。我们知道，社会科学研究的的关键在于问题意识的确立，而独到的并且对社会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意识的产生又离不开对一个社会中有关现象的整体性把握。值本书再版之际，我想对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来，中国集体抗争行动的发展轨迹及其背后的原因用本书中阐释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进行解读。本序旨在指出，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集体性抗争行动的发展轨迹不但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我们把握当前中国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在毛泽东时代，自发性的集体性抗争事件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但占主导地位的则是由国家发起的、意在对社会及文化进行改造的政治运动。这类运动中持续时间最长、给中国社会带来灾难最大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去世后，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由国家发起的政治运动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进行了反思，民众的价值观也日益多元化，而由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空间则使得自发的集体抗争成为可能。中国的集体抗争在1976年后的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6~1989年，1992~2002年，2002年至今。

1976~1989年发生了不少集体性抗争事件，其中著名的包括，1976年在毛泽东去世前夕发生的天安门“四五”运动、1978~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70年代末的知青返城运动、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的“文化大革命”反思运动，以及1986~1989年以1989年风波为核心的学生运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集体行动具有大规模、政治化和针对中央三个特点。这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有着强烈的对社会及文化进行改造的愿望，

再加上当时中国政府政令畅达，其政策能够对一个阶层甚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影响，一旦国家政策发生错误，受这些政策影响的人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奋起抗争。“文革”中数百万城市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来到农村，“文革”一结束，知青们马上就通过集体抗争要求回城；“文革”中许多干部受到清洗，“文革”一结束，这些干部马上就要求平反。“文革”带来的灾难还带来“信仰危机”，这成为西单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风波产生的一个很大的动因。当时的政府对集体抗争事件所采取的对策，基本上可以总结为政治化对抗加控制性开放。当时的政府对大规模集体行动的突然到来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加上他们都是极“左”时代过来的人，在处理集体抗争时难免会采取一些在新形势下已经完全行不通的方式。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已成为当时中国高层的普遍共识。为了维持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并维持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上树立起来的新形象，政府在面对社会抗争时不得不采取适可而止的态度。这正是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不能把反精神污染运动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贯彻下去的根本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就是在不断改革中不断走近世界。开放的环境给集体抗争行动提供了机会，再加上80年代末中国发生经济危机及其他种种原因，于是就有了1989年风波。

1989年以后，中国政府拒绝推行东欧式的政治改革，但非常成功地展开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成功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中国90年代以来的改革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社会不平等的增加、官员腐败、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农民税收负担过重、城市周边农民丧失土地、环境污染，以及犯罪率上升等。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新的集体行动具有以下特点，即规模大大缩小、抗争动因主要是经济利益而不是政治原因、抗争所反对或诉求的对象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官员或公司企业的老板和经理。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大量下岗工人抗争运动、农民抗税运动、复员军人闹事，以及不同规模的骚乱，都是例子。

90年代集体抗争事件新形态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在以下方面的变化。首先，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政府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许多方面逐渐退出。与80年代相比，人们的工作和收入不再与中央政策紧密挂钩，即使面临下岗和失业等问题，他们也很难直接怪罪中央政府。许多社会矛盾因此而地方化和非政治化。除了一些发生在大中型国有企业的

集体抗争事件，中央政府已不再是集体抗争的主要目标。在这一时期，中国对经济罢工和闹事，基本上不允许地方政府采取镇压方式；只要地方闹事不酿成可能在海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的流血事件，中央政府一般不直接介入地方对于集体抗争事件的处理。国家的这一策略，进一步增强了集体抗争的地方化和非政治化倾向。

其次，集体抗争的地方化和非政治化还取决于知识阶层在社会上地位的变化。90年代后进入主流的知识分子在经济上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者和受益者。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目前都享受着新兴中上层城市中产阶级的优越生活，他们自然不会对激烈的社会变革产生浓厚兴趣。同时，中国社会在90年代后变得日益多元和复杂，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控制手段也趋于高明；或者说，知识分子获得了一定限度的自由。社会多元化加上知识分子所获取的有限自由，加速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现状的理解的分化。于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新左派等各种思潮不断涌现，中国不再有1989年风波之前出现的那种统一的反体制话语。没有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的支撑，中国的抗争运动大多只能停留在经济利益取向阶段。因此，在这一时期，虽然中国集体抗争事件在形式上多种多样，从上访、请愿、绝食、怠工、罢工、示威游行、骚乱、扣留甚至伤害国家干部到小规模暴力对抗，应有尽有，而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外一些学者所谓的“依法抗争”或“以理抗争”，但基本是在经济层面针对一个地方或单位的具体事件作出的反应，高度政治化的闹事基本没有。

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包括在目前所采取的处理集体抗争的手段，也产生很多问题。中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试图强化信访渠道，希望通过加强各级政府对信访事端的处理能力去平息集体抗争事件及苗头。但由于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已经变得日益复杂，信访所反映的许多问题只能通过法律、制度化的社会运动以及利益集团政治才能得到更有效的解决；许多信访所涉及的甚至是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得不到解决，至少是不应该由国家出面解决的问题。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也对集体抗争事件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包括控制和打击跨单位、跨行业的串联组织活动与抗议活动，对组织闹事的带头人予以严肃处理等。政府的这些对策进一步促进了集体性抗争事件向着小规模化、地方化和经济利益取向的方向发展，从而避免重演大动乱。但与此同时，这些对策也大大降低了社会在集体抗争行动方面的组织能力，使运动积极分子和闹事民众不能在制度化的讨价还价过程中走向政治成熟，阻碍了这一时期所发生的集体性抗

争朝着在西方常见的制度化社会运动或更为缓和的利益集团政治的方向发展。

中国集体性抗争事件发展的最新形态在 21 世纪初逐渐成型，并伴随领导人更替后的新政及其社会影响的发展而在近年趋于成熟。在这一阶段，集体抗争事件继续保持中小规模、经济利益取向、地方化这些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就已形成的特点，但同时也出现以下几种新形态。

首先，是公民权利意识前所未有的提升（表现在反圈地、业主维权、艾滋病患者维权等运动的兴起）和 NGO 的迅速发展。

其次，是上访的社会运动化（表现在“上访村”的规模加大并出现大量“上访专业户”）、地方环境污染抗争的增多、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膨胀性发展，以及中大型规模骚乱的渐趋频繁。上述集体行动有着不同的产生原因和不同的发展趋势，但从整体上看，其发展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城市中产阶级运动出现部分制度化的发展趋势。比如，大量 NGO 与各级政府建立了甚为密切的联系，并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比如，大多数城市中产阶级环保组织与环保局及其他有关政府部门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推动着环保事业的发展。二是集体抗争行动有着从竞争型（competitive）和反应型（reactive）转向主动型（proactive）的趋势。比如，十几年前，中国的家庭教会不得不在政府控制的夹缝间小心存活。而在今天，家庭教会兴建的引人注目的教堂已经随处可见。各地家庭教会还普遍采取种种不为当前法律法规所允许的手法来谋取发展（如开办青少年基督教夏令营和在公共场所传福音）。不少家庭教会甚至主动挑战政府。比如，成都的“秋雨之福教会”在 2009 年公开举行祷告会，借此获取国际影响，并扩大该教会乃至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三是民粹主义在中国迅速抬头。在当前，许多昨天的弱势群体正在变得强势，金钱成了国家解决社会抗争的唯一法宝，而民众的欲望则在日益提高，国家的“维稳费”膨胀；即使是骚乱群体中出现了对公共和私人财产的大规模破坏行为，军警也往往视而不见；曾经的问题是警察打人，而近年来警察却被戏称为“弱势群体”。四是大规模的骚乱活动在近年出现上升趋势，以至于国内有人专门为近年来的骚乱制造了“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性事件”这样似是而非的概念。

中国集体性抗争行动的上述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近年来国内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因特网和手机普及，以及一些有效的社会抗争手段在社会上被模仿而逐渐广为人知的结果。更重要的，这些新发展还是中国国家结

构和近年来一系列国家政策的产物。首先，绩效是当前中国政府的主要执政基础。政府近30年来兢兢业业谋求发展，使其在客观上成为当今世界上少有的最有作为的政府之一。它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长足的发展，给广大百姓带来了巨大实惠。但中国的多数老百姓却肯定不会像我这么看。在老百姓眼里，从政府那里拿到好处是理所当然的。政府的“亲民”政绩只会提高百姓的欲望，从而使其产生对政府更高的要求，为以后的执政提高难度。民欲难填，众口难调，一个有效的政府因此面临的是怨声载道。

并且，中国目前对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的发展有许多限制。这些限制对“维稳”自然有当前的好处，但同时又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失去了一个在政治参与中、在争论中、在讨价还价中逐渐获得政治现实感的机会。我每年回中国多次，每次回国都会为中国老百姓的普遍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缺乏政治现实感而惊讶。中国许多人都会在饭桌上抱怨社会上的种种问题，似乎国家快速发展的最大动力就是无数骗局和腐败。数年前北京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在与我聊天时表示，如果毛泽东还活着的话，他就要跟着去造反。其原因竟然是对他在四环外买了一套不错的房子，但需要付20年月供后才能属于自己表示极其不满。我认识的一个成功企业家也表示要跟着毛泽东去造反。究其原因，竟然是他因为工作需要而不得不经常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而他对一些年轻官员盛气凌人的态度气愤不已（这也是过度强调干部年轻化的一个负面后果）。这里我并不是说这些牢骚满腹的人有一天会真的揭竿而起，但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却可能成为骚乱中“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一分子，为动乱推波助澜。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政府的政策大规模向资本倾斜。此后十余年中，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国家财政有了根本性改善。但这一政策却也带来包括贫富悬殊和环境污染在内的许多社会问题。本届政府采取亲民政策并大大加强吏治。近几年来，我在宁夏、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河南和福建等地走访了不少以前属于穷乡僻壤的地方，同时也特地接触了不少生活在城市里的下层群体。我的总体感觉是，中国社会下层百姓的生活水平在这几年中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如果我的观察接近事实的话，按照一般想象，中国这几年应该是百姓安居乐业、社会一派和谐，但事实却是集体抗争风起云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府没有让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制度化的、社会运动式的抗争，或是利益集团式的讨价还价的勇气。因此中国政府只能采取父爱主义的办法，用钱来解决问题，并通过政策给百姓许多好处。这种父爱主义的办法会产生以下后果。

第一，老百姓拿到好处后第一天不免兴高采烈，第二天觉得理所当然，第三天就提高了欲望。这就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执政压力。

第二，一旦政府以父爱主义方式管制某件事情，这一事情马上就会上升到政治高度，或者一旦政府做得不尽如人意，老百姓马上就会要求政府负责。事实上，近十年来，中国许多原本已经非政治化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走向政治化；百姓对国家的依赖在加重。这是很危险的倾向。

第三，父爱主义方法有时甚至会使老百姓在拿到好处的同时，提高了对政府的失望。比如，在我去过的某一贫困地区，当地政府为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根据家庭收入给予不同数量的补贴，鼓励他们盖新房。当地的居住条件的确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善，但许多老百姓却很不满意并表示对政府很失望。其原因是，目前农村许多家庭都有青年外出打工或做生意，各家的实际收入虽然邻里之间也许知根知底，但政府却没法客观评估。因此，常有那家觉得这家占了便宜，这家觉得那家占了便宜，纷纷认为自己吃了亏。不少人认为能否与干部拉上关系才是得到补贴多少的关键。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不公正感，怨声载道。就这样，政府做了好事，却同时把老百姓的住房问题转化成政治问题，从而为自己制造了麻烦。中国目前的亲民政策并不是一无是处。该政策其实是国家在不触动政体的情况下，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而能够采取的唯一方法，并且确实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不少好处。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政策所造成的一系列非期然性后果。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现行体制的框架下为维持社会稳定确实做了很多努力。当前中国的吏治不可谓不严，但在许多老百姓眼里，当官的仍然大都是贪官污吏。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也大大开放了主流媒体对灾害和集体抗争事件的报道，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显著降低谣言在集体抗争事件中发挥的作用。事实上，中国的宗教政策这几年在不断走向宽松，但不少家庭教会的领导者并不领情，而政府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有效的对策。中国政府近年为了提高少数民族群的生活水平而投入的资金不在少数，但少数民族群闹事却有增无减。从总体上说，中国现在正处于这么一个阶段，即，政府几乎采取了在其体制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可以采取的一切措施，并为维持社会稳定而耗费了大量资金，但集体抗争事件仍然层出不穷；除了一些城市中产阶级的社会运动，中国政府完全没有能力将目前发生的集体抗争事件纳入体制的轨道。

我并不是说中国马上又会发生一场大规模反抗运动。依我所见，集体

抗争事件无非有三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的理想形态：革命、骚乱和制度化的社会运动。中国对集体抗争事件所采取的对策不但未能将其纳入体制轨道，反而提高了老百姓的期望，并重新政治化了许多原本已去政治化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只要中国能继续维持良好的经济状况，以及目前所具有的行政能力，中国政府就能够不断采取种种措施以避免大规模动乱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矛盾的表达就挤向组织性很差、破坏性较大的骚乱。这就是这几年所谓“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性事件”增多的原因。问题是，骚乱不但对公共秩序和财产有着很大的破坏性，而且不可能被制度化，而国民经济也不可能永远好下去。因此，一旦国内经济发展出现停滞，一旦国家财政收入不能再以每隔几年就翻一番的速度增长，胃口早已被吊大的中国老百姓的情绪就会向同一个方向集聚。到那时，如果主流知识阶层也不再能拿到今天这样的物质好处，中国就有可能再发生一次反体制性思想整合。有了统一的反体制思潮和广泛的社会不满，一场反体制运动也许会发生。

只有温故才能知新，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为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为避免某些社会悲剧的重演作出努力。

2011年12月15日

第一版序

自1993年起，笔者在加拿大的麦基尔大学和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连续讲授了十多年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课程。2004年春季受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之邀，我又向清华社会学系研究生讲授了这门课程。本书在清华讲课录音以及笔者多年的备课笔记基础上扩展整理而成。在有限的篇幅内，本书既要介绍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的社会学理论的历史、现状及发展逻辑，又要对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发展中的一些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做出较为深入的分析。为了平衡这两点，我在选材方面做了很大的取舍。我在取材时尽力包括美国和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领军人物及他们的工作。但是，由于篇幅的关系，其他一些高质量工作却未做介绍。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在做出取舍时自然有着许多思考，我甚至认为本书中所提倡的社会运动理论，以及本书对社会运动理论的讲授方法，比起西方学者通常所采取的方法有着许多优点。但是，我不想给读者以这样的印象，即本书所梳理的逻辑脉络是理解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发展的唯一方法，或者说本书所介绍和提及的工作囊括了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的所有精华。我希望国内想通过本书来了解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发展的学者能在本书所提供的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阅读其他相关文献，以对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发展有一个自己的体会。

读过西方社会运动理论文献的学者，一眼就能看出本书与其他有关社会运动研究的专著在理论角度和立意上有着许多明显的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一，西方学术权威一般都希望通过他们的研究找到几个固定的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从而构造出一个能对任何社会运动进行指导性解释的模型（如果以图来表示的

话，这种模型就像一个计算机程序流程图)。本书把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条件简约为变迁、结构、话语这三个因素，并且指出这些因素之间并不存在一种一成不变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在对社会运动的研究中我们所有的仅仅是一些分析问题的切入点，而不是具有普适性的理论。第二，西方学者把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看做不同性质的事物，并就这三类现象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理论。本书则强调了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这三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和可转换性，以及把这三者放在一个统一理论框架下加以考察的重要性。本书不但讨论了在西方占有主流地位的社会运动理论，而且介绍了种种革命理论以及在西方备受攻击的集体行动理论和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第三，政治过程理论是目前在西方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运动理论。政治过程理论强调社会运动是政治性而非病理性的行为，政治过程理论同时重视组织、社会网络、机会和策略这样的中观和微观条件对社会运动起源和发展的影响。这些观点，包括依随着这些观点发展起来的一些全新的研究路向，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本书同时认为，政治过程理论过度强调了影响社会运动发展的微观机制而忽略了宏观因素；在微观机制中，政治过程理论又片面强调了理性选择、策略、组织和网络以及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忽视了情感、文化文本、空间环境等其他因素对社会运动的起源和动态的影响。本书进而认为，政治过程这一概念仅仅定义了社会运动的性质，它没有给出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动态的宏观机制，而决定社会运动（特别是大型的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轨迹的是一个社会中国和社会的关系。社会运动背后的国家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变迁、结构、话语这三个宏观结构条件对该社会运动的影响方式，以及这些宏观结构条件和微观机制在该社会运动中所呈现的特定的作用方式。

我希望读者不要简单地把本书的观点和分析看做是对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批判。本书对许多西方社会运动研究成果做了详细介绍，旨在引导学生如何在不迷信的前提下去欣赏西方学术特别是以机制为核心的研究方法的精粹。如果我们不能以西方人的这种态度和方法来作为做学问的出发点的话，那么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我们的知识就难以得到积累，研究也很难深入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将西方学者在研究他们社会中的社会运动时所提出的学术问题完全当作中国的问题，并简单按照西方发展起来的一套方法来研究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对社会现象所做出的分析在外行看来只能是隔靴搔痒。本书与西方同类作品的一些主要不同都可以看做是

笔者在试图把西方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努力。

我与西方大多数研究社会运动的专家在对社会学方法的理解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与西方学者同时也有着截然不同的问题意识。这就是本书之所以与西方同类作品不同的两个关键。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学者对社会学研究科学化有着很大的追求，笔者欣赏他们的这一努力并在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他们所取得的一些主要成就，但是本书同时也强调了这些努力背后的一些局限。笔者以为，虽然社会学研究的重心的确应当放在科学（机制性的解释）而不是艺术（现象性的解读）上，但社会学研究就其本质来说只能是哲学、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本书在介绍西方学术的同时花了很大的笔墨检讨了社会学研究中的种种方法论问题，它因此也可以被看做一部关于社会学方法论的读物。笔者与西方社会运动研究者之间的一个更大的区别在于不同的问题意识。对于西方学者来说，在当前的西方社会中，骚乱性的集体行动是社会中的边缘现象，而革命则是历史现象或者是非西方国家现象，基本上已经制度化了的社会运动才是他们社会中集体抗争活动的主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学者强调了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不同，并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对社会运动的策略、组织、资源和政治机会等问题的研究上。作为中国学者，我看到的是中国一日千里的经济发展和变化以及随之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在目前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社会上各类集体抗争事件层出不穷，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那种大规模政治动乱也离我们相去不远。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国家来说，产生这些现象并不奇怪。西方每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都有过类似现象。问题是，西方有些国家比较容易地走出了这个现代化的“阵痛期”，而其他一些国家却曾陷入了反复的政治动荡之中。本书把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放到同一个框架下来进行考察，并强调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可转变性。我这样做有着很强的现实目的：通过对西方历史经验的探讨，我想让读者了解破坏性较小的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怎么才能成为中国集体抗争方式的主流，从而降低集体行动和消除革命发生的可能性。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多方的支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教育部春晖计划资助了我在清华的讲学，李强、沈原和孙立平教授以及李彩霞女士对我在清华期间的教学和生活照顾有加，在此表示深切感谢。特别是沈原教授，他在百忙之中过问了本书写作的全过程。他邀请我加入清华社会学讲义的写作工作，组织学生对我在清华的授课进行录音和整理，多次过问本书的

写作进展，并对整个讲义的写作旨趣发表了许多远见性的指导意见。没有沈原教授的直接过问和支持，本书可能就不会成为现实。我对沈原教授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提供的无私帮助谨表谢意。人民大学的冯仕政教授阅读了本书文稿并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许多同学帮助整理了讲课录音，他们是张璟、李洁、叶鹏飞、姜赟、李洋、张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谢寿光社长和王绯女士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童根兴编辑在书稿的成书过程中做了认真的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笔者将对本书中所有的疏漏和不足负责。

最后，我将本书献给我的两个可爱的女儿：琳达和莉立。

赵鼎新

2005年11月于芝加哥